

人工智能时代下 劳动者的困境与纾解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陈韦宏 □罗志佳

人工智能作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形态、劳动方式与评价认知,对促进社会职业形态更迭、劳动方式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在推动生产关系重构的同时,亦间接导致了社会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对劳动者的就业择业造成了冲击。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关键策略在于构建劳动者友好型制度环境、推动现代教育体系改革,从而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客观研判技术影响,以制度建设为牵引,强化产教融合与人文关怀,聚焦劳动者的软实力培育,塑造劳动者的综合竞争力。在协调技术进步与劳动者个人利益间谋求动态平衡,营造人机共生的和谐环境。

关键词:人工智能;劳动者;技术变革;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49;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5)02—0026—09

引言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2023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过4300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1]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加快“人工智能+”迭代动态发展,是当前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各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优化了传统的劳动力结构。但社会上也涌现出一些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担忧。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2]“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2]41}。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提到:“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3]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而客观评估人工智能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已然成为一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基于此,本文从劳动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实际影响。

国内外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现实影响和应对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就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表现而言,宏观上学者们重点审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剧了高低收入群体间的工资差距。^[4]但同时,人工智能具备的创新效应又提高了社会总产出,提升了工作效率。^[5]微观上学者们指出个体需对技术驱动的组织变革保持敏锐洞察,在持续学习中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6]基于上述分析,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应归于价值中性的技术范畴,难以对其产生的社会影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22BZX039)

作者简介:陈韦宏,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罗志佳,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响作简单定义。为此,有学者尝试推动以人机协同为范式的数智劳动,形成数智化工具与人类劳动相融合的劳动方式。^[7]以最小化创新损害为政策依据,营造有利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社会生态。^[8]学者们的研究为客观评价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照,但其中仍存在尚需完善之处。其一,研究同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紧密程度有待提高。既有研究多从社会境况出发,对政策导向与教育改革的关注度不足。其二,现有研究尚未完全跳出以数字化、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发展范式桎梏。诸多研究将劳动者视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但对劳动者作为独立主体的内在需求、价值诉求、心理状态等缺乏深入探究。其三,国内学界对人工智能议题的思辨相对依赖西方国家已形成的分析范式,尚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提炼空间。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立场、方法,以大历史观审视人工智能发展,在宏阔的时空坐标中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影响,系统探讨人工智能为新时代中国劳动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为推动劳动者适应新型生产关系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一、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生产关系重塑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生产关系范式,是指以人工智能系统及其衍生技术为核心驱动要素,对传统生产关系进行系统性重构后所呈现的新型社会经济关系形态。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升级迭代为生产关系变革提供动力,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协同演进。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的生产关系变革也潜藏诸多风险,其影响的深度、广度尚需系统评估及动态研判。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出现已对劳动者的岗位匹配与职业流动等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生产关系变革,系统评估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影响机制,以期在推动技术进步与保障劳动者间达成动态平衡。

(一) 职业迭代与分工关系重塑

大卫·李嘉图指出,机器降低了对无差别劳动的需求,导致了技术性失业。^{[9][19]}部分劳动力被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替代的同时,劳动力结构也随之发生转变。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机械化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纺织、采矿和运输业的自动化,导致大量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被迫失业或转型。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电气化大发展使得工厂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电气设备的普及推动劳动者适应新的生产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时,复杂的计算和控制任务逐渐交由机器完成,以往熟练工才能胜任的精细化劳动开始由机器代劳,劳动者的体力负担显著减轻。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工业化革命的再次推进,其产生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对体力劳动的替代,而是深入渗透至脑力劳动与创作领域。马克思在谈及机器自动化生产时,曾深刻揭示出机器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劳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马克思认为,为攫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通过引入大机器,让产业对劳动者的进一步压榨成为可能,减少了资本对熟练劳动者的依赖,劳动者逐渐异化为大机器的附庸,被迫参与单调而重复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10][523]}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者的冲击不仅表征于工作岗位的缩减,同时也表征于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延长。自动化机器的引入使劳动过程日益碎片化,劳动者在细微分工下失去对劳动过程全貌的感知,劳动者的创造性被压制,对劳动实践的认同感与成就感被削弱。^[11]在竞争的驱动下,资本家愈发需要通过引入先进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使劳动者的处境愈发艰难。对于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劳动者而言,他们面临着被大幅裁员的风险。

2024年初,以“萝卜快跑”为代表的无人驾驶网约车同传统巡游出租车的矛盾登上热搜。“萝卜快跑”在武汉示范区全线投放,投放初期10公里车费约为4元至16元,如此低廉的车费大量挤兑出租车载客单量,不少的哥表示,每日接单量仅为无人驾驶网约车出现前的一半。虽然无人驾驶在短时间内替代出租车行业的概率渺茫,但这一事件却传递出人工智能正在挤占传统行业生存空间的信号。显然,作

为技术发展的又一杰出代表,无人驾驶的出现必然最先冲击到传统载客运输行业,诸多从事类似于运输行业的低端服务业劳动者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获客形势。众多劳动者因缺乏高水平技能而在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冲击时极为脆弱。即便在冲击中勉强保住岗位,薪资水平也会因技能限制停滞不前,并较难获得晋升机会,这类弊端进一步使低端服务业劳动者在社会结构变革中被边缘化。要统筹劳动者落后于机器发展的现状,不仅迫切需求劳动者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同时呼吁政府出台干预举措,通过技能培训与社保政策,为低技能劳动者兜底。

(二)劳动方式的加速变革

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维度审视,不难发现劳动方式演进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客观发展规律。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早已借助日益精进的劳动工具,从标准化、流程化的劳动方式向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范式演进。与此同时,人机协同互补成为劳动过程的关键构成,劳动者在回归为生产过程主导者的同时,更需适应人机交互情境下的新型劳动关系与生产模式,重塑自身的职业技能谱系,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协作对劳动质量、效率与创新的要求。同时,在区别行业性质与劳动性质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在内容重复度高的行业呈现出明显的人机竞争趋势,而在创新度高、工作内容重复度低的行业,则呈现出人机协作、互相协同的劳动新样态。人机协作模式的出现使劳动者的角色发生转变,劳动者不再简单执行任务,而是更多承担监督与判断职能。亦是说,以往一部分重复和低附加值的岗位将被取代,新的岗位则围绕人工智能的运行设置。^[12]劳动方式的转变正倒逼着劳动者主动学习机器逻辑,建构与机器同频共振的工作样态,以降低自身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

从生产空间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进化加速推动了劳动场域的泛在化延展。智能化的远程协同范式被频繁嵌入日常工作情境,突破了传统劳动过程在时空向度上的局限性。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异地协作、多方互动的劳动方式渐成常态,人工智能在其中扮演着信息汇聚、流程协同、智能调度的关键角色,以多点触达、全域覆盖的方式介入组织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由此,工作空间呈现出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分布式拓扑形态,处于地理远端的劳动者,通过智能任务调度与远程协同工具间接介入项目执行,办公地点从传统的固定场域转移到地理维度低度集聚、时间维度高度融合的协同空间中,极大拓展了劳动者的工作自由度与弹性化选择。然而,空间的一体化虚拟化趋势亦可能加剧工作时间无限延展的社会隐忧,劳动者需要重构工作与生活的秩序,在应对多样化工作需求的同时,谨慎治理远程协同可能诱发的边界失衡风险。正如互联网出现后,工作群内的消息从简单的信息传递演变为群成员默认接收执行的“信息绑架”,劳动者的消遣场域边界因科技发展而模糊化。工作场域的灵活化使得雇主在劳动力筛选与录用过程中拥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空间,部分非核心团队人员被迫转为无固定岗位的灵活就业者,长期稳定的雇佣岗位被进一步削减,短期、灵活的非标准就业岗位成为替代选项。在人工智能的介入下,劳动者所产生的变化不仅局限于形式层面,同时具象化于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的关系上。在传统工业社会语境下,劳动者对机器的操控遵循简单工具理性,主客体间保持清晰稳定的从属关系。然而,人机交互呈现出迥然有别的技术特质,劳动者须以更复杂的认知方式理解并内化机器运行的算法逻辑,方能在抽象层面实现对机器的有效掌控。而对这一交互范式的领悟,正日益成为现代工业组织甄选劳动者的核心标准。

(三)人机竞争忧虑与人机共生之道

“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10][495]}马克思对技术发展的批判性分析反映出劳动者被替代的恐惧,其中较为浅表的恐惧源于对失去收入的担忧,而较深层次的恐惧则来自对自身认同的消解。丧失岗位,不仅意味着经济来源的中断,更是对劳动者社会存在感与价值感的重大打击。马克思强调:“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

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10]495} 在经济的波动中,利润的浮沉使资本家必须动态控制工资成本,部分工人被裁退,无奈退而求其次地涌向低门槛的工业部门,从事利润更微薄的服务业或密集型制造业。制造业中充斥的劳动者越多,劳动力的价格就越低,最终降低到它的应有价值之下。劳动者的价值随着机器效率的提升而逐步消解,劳动者因此失去了与资本抗争的力量,被逐渐边缘化为“过剩人口”。在涌入大量“过剩人口”后,服务内容的同质化将压迫原有的产业生态,导致服务内容与形式的加剧内卷。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为了不轻易被机器取代,必须向雇主“主动”要求降低自身薪资,同时努力提升劳动素养。

过度竞争的机制,表面上提升了岗位对个体的依赖程度,但深层次却反映出人机竞争的潜在矛盾。具体表征于劳动者在面临技术的替代压力时,其发展空间与议价能力受到结构性制约,陷入“被替代的技术性失业”困境。与此同时,在岗位胜任力的内因驱动下,劳动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活动,以应对不明朗的发展形势。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劳动者的认知负荷,更会侵蚀劳动者的闲暇活动与生活空间,引发职业倦怠等心理问题。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劳动者的工作正日益异化为单调乏味的机械重复和被动应对。面对这一窘境,劳动者唯有从与工作相关的量化指标中寻求职业安全感,这一现象折射出技术进步对劳动过程的深刻影响,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生产效率,但也导致劳动过程的“泰勒化”,即将工作流程量化,使之更易于标准化管理与考核。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沦为被动的“指标执行者”,其劳动价值和职业前景也依附于指标的达成情况。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者在分工生产下逐渐失去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沦为资本的附庸。“机器带给他们的只是‘短暂的不便’。然而,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10]497} 细究技术诞生的初衷,其并非旨在同劳动者相对立。技术发展的目的在于为人服务,并为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因此,劳动者大可不必将人工智能的出现视作洪水猛兽,而应秉持开放的心态,客观包容地看待人工智能的社会功能,将技术的涌现视作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人工智能造成劳动者困境的机理探赜

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技术变革,这一变革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看待人工智能对劳动者造成的困难和影响时,应当一体两面,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由机理入手客观分析其产生缘由。

(一) 技术变革引发劳动力需求内缩

技术作为人类身体机能的延伸与扩展,显著提升了人类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边界。然而技术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相悖的特征,即技术不再仅仅作为服务于人类需求的工具存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构建并规约着人类的活动范式、需求取向、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这种技术理性对人的规训与制约,与技术发展的初始目的产生了本质性的背离。这一现象凸显了技术异化的问题,即技术从人类的创造物转变为人类生存实践的决定性要素。^[13] 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例,其对劳动者的影响已然深刻改变了劳动者的行为范式,并逐渐成为决定劳动者工作效率的关键要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引入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在不变资本投入增加的同时可变资本投入减少;其二,劳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单一劳动者可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降低用工需求;其三,岗位的结构性减少。可变资本减少导致岗位缩减,尤其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工作领域岗位缩减更为严重。由此,用人单位在生产中愈发依赖资本投入,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被技术挤压得愈发狭窄。原本需要多名劳动者共同完成任务,如今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协同系

统,由单一劳动者在更短时间内高效完成。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10]727-728}

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深度渗透正在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具有较高智识的知识型劳动者,凭借其在复杂决策和战略管理层面的独特优势,在劳动力供给相对稀缺的市场环境下,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在劳资博弈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与之相对应,缺乏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岗位面临持续萎缩的下行压力,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下降。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相对地位被持续弱化,特别是那些未能适应技术变革的劳动者,其就业岗位正被技术迅速替代,陷入了被资本和技术双重挤压的发展困境。技术加剧了劳动者的两极分化,加剧了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对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挑战,削弱了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技术变革对社会技能需求的重塑

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技能结构提出了全新的系统性重构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用人、高层次选人的趋势。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编程、复杂系统管理等前沿技能,已然成为劳动者应聘入岗的基本标准。纵观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演变轨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变革无疑重塑了劳动生产的基本形态。在此背景下,高技能的劳动者将成为炙手可热的稀缺资源,大量无技能、无学历、无经验的劳动者则面临被拒之门外的窘境。从劳动形式看,劳动合同的履约模式日益灵活化,零工经济和短期聘用逐渐成为主流趋势,用工单位在业务高峰期倾向于扩充劳动力规模,而在平稳期则更青睐精简高效的骨干团队。在此情境下,众多劳动者将被迫适应频繁更迭岗位、变换工作地点的非典型劳动形态,长期稳定的就业保障将成为奢侈品。无论是人工智能引领的技术变革,还是其他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无不要求劳动者审时度势,提升自我认知,优化知识结构。然而在技术变革的阵痛后,总能孕育出一批契合时代需求的新兴岗位,对于未雨绸缪、勤于进取的劳动者而言,危机背后也蕴藏着机遇与发展。

社会技能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引发了对劳动者教育范式和教育内容的变革诉求。然而,部分劳动者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与当前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明显错位,教育供给与社会技能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大量待业的劳动者滞留于职业转型的阻滞期,无法顺利实现职业发展目标。与此同时,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方面也困难重重。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高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供需缺口日益扩大,而低技能劳动者虽然供过于求,但其培训周期长,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经济效益。教育体系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度不足而导致的回报率下降问题,不仅影响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前景,同时也制约着用工单位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劳动者,另一面却是招不到人的企业,在技术发展的撮合下,这一相互矛盾、稍显荒诞的用工境况却真实地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14]688}因此,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教育体系变革,才能有效回应生产关系的变革需求,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矛盾的用工境况,推动劳动者适应复杂技术环境。

(三)技术变革对劳动者职业发展构成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正深刻冲击着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感,模糊了其既定的职业发展路径。技能提升与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之间并非呈现出单调递增的线性关系,部分劳动者的学习效率与接受程度无法同步于技术发展的步伐,不断拉大的技能差距反而使劳动者疲于应付。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其不仅担心丢失岗位,同样痛心于自身在社会生产中的价值边缘化。^[15]未来市场不再对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抱有持续需求,也不再需求类似商品的生产,正如数码相机的出现彻底摧毁了显影工人的存在价值,人工智能的兴起也可能使部分工人的产品失去市场价值。在深知自身岗位会被机器取代,却又难以快速掌握新技能的情况下,劳动者可能滋生出负面情绪。此时,技术进步并未直接转化为职业安全感,反而加

剧了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命运的焦虑感。^[16]受制于学习能力的不足与时间资源的匮乏,部分劳动者在这场技术追逐中难以保证自身岗位稳固,进而导致心理上的失落感以及对自身劳动价值的怀疑。马克思在描述工人的境遇时提到,“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14]59}。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加重劳动者的焦虑感,削弱劳动者的主体性,使得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异化为支配和威胁其自身的异己力量。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职业晋升路径日益模糊且难以预测。在传统职业发展模式中,劳动者的晋升路径相对清晰,通过积累工作经验达到逐级晋升。然而在人工智能介入后,劳动者因无法评估技术的冲击效度,进而难以确定自身岗位的稳定性并无法制定长远的职业规划。这导致劳动者在关键职业抉择时举棋不定,大大增加了劳动者职业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由于行业的不稳定性与技术的快速迭代,新学习的知识可能被快速淘汰,劳动者付出的努力并不必然转化为相应的职业回报。投入与回报的不匹配加剧了劳动者的危机感,部分难以为继的劳动者被迫“躺平”。为提升自身安全感,劳动者既需要增强自身技能,也需要主动谋求其他下位替代岗位。但无论是何种方式的提升,无疑都是对劳动者生活压力的显性放大,加剧了劳动者内卷。从工作生活平衡的角度来看,过度的竞争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其精神压力及焦虑感,^[17]对企业存续及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者的纾困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8]33} 2024年6月,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19]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环环相扣,作为科技要素的代表,人工智能应同教育、人才培养构建协同发展机制,激发时代创新活力。为此,应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多维度逻辑视角,构建立体化、系统化的应对策略。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来引领社会教育变革,进而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与能动性,系统化地构建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时代纾困赋能的协同机制。

(一)构建劳动者友好型制度环境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者,既面临技术变革的岗位短缺,又面临同侪竞争的收入削减危机。鉴于此,国家有必要立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行业劳动者的实际情况,制定长远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在宏观调控与微观施策间实现动态均衡。2017年颁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系统化布局,该规划明确提出构建人工智能创新体系,以科技引领、系统布局、市场主导、开源开放的基本原则,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力发展。^{[20]6-7} 然而,鉴于人工智能迭代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政府有必要及时召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资深从业者,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的新业态,推动制度及指导意见的常态化更新,使之更具前瞻性与针对性。指导性意见的出台,不仅应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方向指引,还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冲击做出前瞻性研判,使劳动者尽早感知技术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结构性失业,并为劳动者职业调整争取时间。

通过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双轮驱动设计推动劳动者友好型制度环境的建立。在产业发展上,“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21]40} 通过建立健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扶持体系,加快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在农业、工业、医疗等领域广泛应用,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支持人工智能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增强产业竞争力,拓展劳动者就业空间。在人才培养上,出台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推进技术攻关,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与此同时,国家应在“托底线、防风险、促转型”的基础上,为劳动者提供必要保障。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完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与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消解部门性或阶段性的劳动力错配风险。针对新兴行业和灵活就业群体探索更具包容性的保障模式,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手段,建立相对灵活的就业匹配系统,以精准化失业救助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此同时,国家还应鼓励社会资本、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方式,建立结构完善、覆盖广泛的保障网络,为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推动适应时代需求的现代教育改革

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正在重塑社会的劳动结构与经济形态,这一趋势对教育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为适应技术变革与产业需求,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使其与技术变革、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已成为一项急需解决的重要任务。现代教育改革不仅是简单对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的迭代,更是对现有人才培养范式的全面升级。现如今,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知识迭代的显著加速以及数字化资源的普遍可及为新型教育实践提供广阔空间。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发展必然会淘汰旧的不适宜的生产关系,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既有分工的重塑。因此,为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和挑战,现代教育改革应明确三大目标:一是培养具备多元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持续变化的用工需求;二是畅通劳动者转型升级渠道,供给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的学习网络;三是缩小劳动者间的技能鸿沟,促进教育资源动态平衡。

为实现上述目标,现代教育体系应当具备前瞻性视角,积极推动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深层次改革。其一,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社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教育机构应当积极增设跨学科、跨领域课程,^[2]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将技术知识与管理、设计、人文学科等领域的知识有机融合,培育具备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同时,重视人工智能伦理构建、隐私保护、算法分析等培训课程,以提升劳动者的人工智能素养,培养劳动者人机协同的关键能力。同时建立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评价标准,改革传统的以分数为主的单一评价体系,践行多元化的评价举措,将知识、能力、素质等纳入评价范畴,引入过程性评估,综合考查学生在学习不同阶段的发展表现。其二,在畅通劳动者转型升级的渠道方面。应在普通教育之外,积极推动职业资格培训与职业教育。支持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以时代需求为方向,更新培训内容与培养方式,突出实践导向。各地应规划职业培训款项,一方面因地制宜培养当地产业劳动者,另一方面与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合作,在师资配备、实训实操等方面形成合力,为处于职业转换期或失业状态的劳动者提供普惠性技术课程与基本岗位培训。同时增强培训监管,形成统一规范的培训标准和认证体系,调动多方主体参与标准制定,明确不同工种、不同岗位的技能要求,为劳动者培训提供标准遵循。推动用人单位将职业培训与招聘录用有机结合,对于培训合格者给予岗位聘用承诺,消除劳动者“毕业即失业”的后顾之忧,激发劳动者参训积极性。其三,在缩小劳动者间的技能鸿沟方面。高校、科研院所、教育培训机构等多元主体应形成合力,在开展支教支边工作的同时,推出数字化教育课程,坚持课程内容推陈出新、简洁高效,始终同职业发展趋势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畅通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化远程职业教育渠道,确保每位劳动者公平地获取学习资源,促进劳动者平稳实现职业转型。

(三)劳动者创造力的激发与软技能的构建

社会实践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和广阔的空间。身处加速迭代的社会中,人们不得不使浑身解数不断适应新的生活状况、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确立与新的关系相适应的

观念和见解。作为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人的主体性被激发出来了,并首先表现为对劳动对象的丰富实践。人的主体性不仅包含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的内生驱动力,亦是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问题与不确定因素的关键所在。在现代科技的加速更迭下,创新能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技术研发领域,而是成为推动多领域融合与跨行业协作的核心构成部分。因此,劳动者内在的能动性与创新力成为人类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相抗衡的筹码,质言之,人工智能是人类既有知识的“复读机”与“整合器”,其无需也不可能拥有类人的创新能力,但创新能力又始终作为时代发展的重要动力存在。^[23]因此,为保证时代发展,就不可能抛弃具备创新能力与强大主体性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也就拥有了同人工智能“竞争上岗”的资格。为此,劳动者可将培养创新思维及提出可行性方案的能力作为自身的发展目标,主动搭建创意思维工作坊,培养发散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同时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积极推进创新创业实践,致力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从社会治理维度而言,应当构建具有包容性与韧性的创新生态系统,着力搭建开放、互信、协作的创新网络,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同时为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实践探索空间与创新试错机会,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劳动者潜能,激发劳动者的内生动力。

除创造力外,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深度介入生产的背景下,劳动者还需着力提升自身软实力,尤其是人际沟通能力、情绪智力等人工智能难以复刻的技能。伴随人工智能的技术精进,非专业人员已难以在逻辑运算与图形推演等方面同人工智能相媲美。因此,普通劳动者应当另辟蹊径,从发展自身软实力方向入手,抓准人工智能的技术空白领域,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其首要任务便是培养高效的人际沟通能力。高效沟通作为现代劳动者在复杂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基础技能,是减少信息误解与冲突的有效手段。基于人工智能对岗位的挤兑现象,劳动者为保证自身岗位稳定,必须具备较为卓越的语言表达能力、跨文化敏感性以及情境适应能力,确保在复杂环境中利用沟通能力陈述主张、收获认同,通过着力提升语言表达的逻辑性、条理性,增强换位思考的同理心,以情理兼备的方式传递信息、消除分歧、凝聚共识,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其次,情绪智力作为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替代的独特人类优势,其作用正日益凸显。尽管人工智能在执行数据处理等任务时表现出色,甚至超越了部分人类的认知与计算能力,但在情绪识别、共情反应以及复杂人际关系管理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人工智能难以察觉细腻的情感交流,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交环境,难以根据对方兴趣点做相应的情绪调适,特别是在客户服务、团队领导及冲突管理事件中,人工智能无法根据客户需求甄别其真实意图,无法根据交往情况妥善处理人际冲突。这些处理复杂人际关系、触发情感共鸣及高压环境下的适当情感反应,是人类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超越人工智能并占据显著竞争优势的关键技能。用人单位应在人力资本培育过程中注重对劳动者情绪智力的系统化培养,构建常态化的情绪智力提升机制,定期开办情绪智力培训课程,通过专业化课程体系增强员工的自我调适能力与人际互动技能,提升劳动者对复杂情形的适应性与领导力。与此同时,劳动者也应积极求变,以创新能力、情绪智力、同理心等为突破口,审慎分析人工智能的局限性,进而构建与人工智能优势互补的能力提升路径,最终实现人机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 核心产业规模达5000亿元[EB/OL].(2023-07-07)[2024-11-09].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7/content_6890391.htm.
-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N].人民日报,2024-11-20(01).
- [4]黄旭,刘红英,闫雪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与应对策略[J/OL].当代经济管理,2024:1-18[2024-12-17].<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41115.1453.004>.

- [5]黄旭,董志强.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极化的影响与对策[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4,44(1):272-298.
- [6]TAEWOO NAM.Technology usage,expected job sustainability,and perceived job insecurity[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9,138:155-165.
- [7]钟平玉,齐磊磊.数智劳动的能力、本质与影响——基于马克思劳动对象化理论的分析[J].经济学家,2024(12):25-33.
- [8]唐要家,王钰.创新友好人工智能监管:目标导向与实施体制[J].人文杂志,2024(9):121-130.
- [9]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M].贺笑,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张旭,张彦泽.GPT系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4):122-131.
- [12]章英娇,管恩琦.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化驱动生产方式变革的逻辑与应对[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4(8):24-35.
- [13]田冠浩,李婷.从“一般劳动”到“自由劳动”——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与重构[J].山东社会科学,2024(9):12-18.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杨礼银,李海艺.论人工智能对人的主体性的冲击及化解路径——基于马克思机器论视角的考察[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4):5-13.
- [16]谭静,欧阳彬.人机工作竞争:生成式AI对劳动者工作的冲击及其出路[J].学术交流,2024(9):157-170.
- [17]DAVID ROTMAN.How technology is destroying jobs[J].Technology review,2013,16(4):28-35.
-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9]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0]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1]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2]苏釜鉴,胡安俊.人工智能的产业与区域渗透:态势、动力、模式与挑战[J].经济学家,2023(2):79-89.
- [23]邓晓芒.人工智能的本质[J].山东社会科学,2022(12):39-46.

The Dilemma and Relief of Laborer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Chen Weihong, Luo Zhiji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ngin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employment pattern, labor mode and evaluation cognition of workers, and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social occupational pattern and labor mode. However,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triggered by AI have indirectly led to the contraction of social labor demand and impacted on the employment choices of workers while promot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is challenge, the key strategy is to build a worker-friendl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so as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ity of workers, objectiv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ak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s a guide,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humanistic care,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soft power of workers, and shape their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We will seek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labors,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for the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machin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ers; Technological Chang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收稿日期:2024—12—24 责任编辑:朱文佩)